



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系统的制衡与统一——《小说月报》“安徒生号”选材探究

李慧*

四川 西南财经大学

儿童文学翻译从晚清至“五四”逐渐从边缘位置走向文学翻译系统的中心。而其身份变化的关键，正是 1925 年《小说月报》“安徒生号”的刊发。本文旨在通过对该号选材原因的探究，揭示与之相关的从晚清至“五四”时期儿童观、主流诗学的嬗变和赞助人系统对翻译选材的影响，并探寻这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制衡、互为所依的关系。

专号中过半数的译者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不可避免地对专号的选材产生了影响。这些译者中也有很多人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共事，同时，商务还是《小说月报》的赞助人，因此，专号的选材或多或少会被打上商务编译所的烙印。另外，作为个人赞助人的《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理念和文学观对专号的译者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以上种种影响因素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三个角度对专号的选材施加着影响，而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又是通过赞助人这一系统而得以贯彻和实施的，同时，赞助人对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的取舍最终确定了专号的选材。因此，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衡与统一，才让当时的儿童读者在 1925 年第一次遇见了世界童话大家安徒生的作品的第一个集束性成果——《小说月报》“安徒生号”。